东盟职教研究简报

2025年第3期（总第36期）

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编制

2025年5月

中心动态

- 泰国拉卡邦先皇理工大学师生来我院交流学习……………2
-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与新西兰塔拉纳基西部理工学院举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工作交流座谈会……………3

东盟资讯

- 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在吉隆坡举行 中国总理出席……………5
- 中国广西拓展与东盟国家质量共建共享共研机制……………6
- 鲁班工坊助力中柬职教合作，培养技能人才——“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7
- 中国与东盟十国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9

国别研究

- 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变迁与发展趋势……………11

热点分析

- “中国东盟+”——全球跨区域合作的一种模式探索……………25
- 深化周边区域国家研究 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28

◎中心动态

泰国拉卡邦先皇理工大学师生来我院交流学习

5月9日，泰国拉卡邦先皇理工大学学生来我院交流学习开班式在高新区校区举行，工学院、人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学工作部等部门负责人出席活动，开班式由国际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代亚松主持。来自泰国的十名同学将在我院开展为期六周的学习交流之旅，不仅为两校师生搭建了沟通的桥梁，更为中泰教育文化交流注入了新活力。

工学院党总支书记周章明对泰国师生的远道而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本次交流学习活动以“中文+建筑工程技术”课程教学模式为依托，旨在丰富中泰学生的学习内容，推动双方教育及课程资源交流，为中泰青年搭建文化与专业技能交流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深化中泰友好情谊。

泰国拉卡邦先皇理工大学教师代表Prasert Kenpankho和Somchai Seviset两位教授表示，此次合作是两校国际交流的重要开端，希望两校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开展更多形式的交流活动。同时，他们也诚挚邀请我院的师生前往泰国交流访问，增进彼此了解，促进共同发展。

“在泰国时便对此次中国之行充满向往，相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能在这里收获知识、拓宽视野，这段经历将对自己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泰国学生代表佳音用流利的汉语表达了对此次交流活动的期待。

此次泰国拉卡邦先皇理工大学师生来访交流学习活动，是我院国际化办学道路上的又一举措，通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学院将不断汲取国外先进教育理念和经验，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来源：国际教育学院网）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与新西兰塔拉纳基西部理工学院举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工作交流座谈会

5月16日上午，铜仁职业技术学院与新西兰塔拉纳基西部理工学院（WITT）举行中外合作办学交流座谈会。新西兰塔拉纳基西部理工学院校长妮科拉·玛丽·康利、商业与技术学院副院长基兰·韦恩·麦肯德里等一行4人，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项光亚，国际教育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学工作部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杨海英主持。

项光亚在致辞时向妮科拉·玛丽·康利一行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学院办学基本情况和国际化办学情况。他说，作为贵州省首个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的高职院校，铜仁职院已累计招收61国1400余名国际学生，连续三年跻身全国“国际影响力50强”，拥有华为ICT产业学院、国家级大数据实训基地等优质资源，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为省级重点专业，2024年与WITT合作项目正式招生，首批35名学生已入学。我院期待进一步加强两校在教学、科研、师生交流等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为师生搭建更广阔的国际交流平台，培养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妮科拉·玛丽·康利校长介绍了新西兰教育体系及WITT的特色优势，尤其强调了该校在商业系统分析、计算机网络技术等领域的教学实力。她表示，两校在生态农业、信息技术等领域具有互补性，期待以此次合作为起点，推动合作向更深层次延伸，在课程开发、科研平台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搭建两校的友谊桥梁。

会上，双方与会人员围绕合作项目的教学实施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一致认为，应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确保教学计划制定、师资选派等关键环节高效协同。WITT讲师哈维·霍与索赫伊尔·伊哈尼分享了教学经验，并期待与中方教师共同开发融合中新特色的课程资源。

此次交流标志着两校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下一步，双方将以此次合作为起点，共同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国际化办学模式，推动中外合作办学结出硕果，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助力职业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来源：铜仁职院新闻网）

◎东盟资讯

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在吉隆坡举行 中国总理出席

当地时间5月27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吉隆坡出席东盟—中国—海合会峰会。会议以“共创机遇 共享繁荣”为主题。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海合会轮值主席国科威特王储萨巴赫以及东盟、海合会国家领导人出席。

李强表示，中国、东盟、海合会国家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背景下，我们建立起三方峰会这样的交流平台和合作机制，堪称地区经济合作的一大创举。三方通过更为紧密的联接和合作，能够造就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圈和增长极，对于各自经济繁荣和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强强强调，各方应当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不断丰富三方合作内涵，努力打造当今时代全球合作发展的典范。一是打造跨区域开放的典范。把三方构建成一个资源、技术、人才等更加高效流通，贸易、投资等更加自由便利的共享大市场。二是打造跨发展阶段合作的典范。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深化三方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密切产业协作。三是打造跨文明融合的典范。推进三方更深层次的人文交流，进一步夯实互信基础，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凝聚更多和平发展的共识和力量。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东盟、海合会加强三方伙伴关系，商讨制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加强基础设施、市场规则等对接联通，拓展能源、农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

促进人员往来和民心相通。中方愿给予东盟、海合会国家更多签证便利。放眼全球，三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沟通和协调，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与会领导人高度评价三方加强合作对促进各自发展和地区和平繁荣的重要作用，表示峰会开辟了三方共迎挑战、共谋发展新篇章，愿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加强互联互通、经贸、产供应链、农业、能源、金融、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加强文明互鉴，密切多边协作，促进三方一体化建设，更好实现强劲、包容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来源：东盟头条）

中国广西拓展与东盟国家质量共建共享共研机制

5月29日“在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帮助下，我们加强汽车标准法规国际交流合作，解决了出口海外市场遇到的技术标准、检测、认证等方面问题，目前，多款车行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吕俊成近日接受采访时说。

5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介绍，近年来，广西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推动与东盟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引导企业加强与东盟国家开展质量合作，以标准、计量、检测、认证“走出去”，助力技术、产品、工程、服务“走出去”，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

广西已推动建成质量服务“一站式”平台165个，为中国和东盟企业提供咨询服务61.86万次，解决技术难题7100多个，培训国际

标准化、计量人才 6300 余人次。

同时，广西积极搭建中国—东盟质量和标准化合作的“南宁渠道”，筹建“一带一路”国家计量测试研究中心，发布首个中国与东盟国家国际标准化合作倡议《南宁倡议》。

广西还推动国际标准联通共建，服务贸易便利化，引导企业在关键和新兴领域进行标准研发，主导、参与制定国际标准 12 项，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目前，广西与老挝、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合作建立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6 万多亩，农产品普遍增产 15% 以上。广西还升级建设中国—东盟/RCEP 标准云平台 3.0 版，累计访问量超 25 万次，有力服务区域经贸往来。广西还助力老挝研制首个国家铁路标准，实现中国铁路标准走进东盟国家的突破。

为打造国际贸易质量名片，广西推动组建中国—东盟新能源汽车检测认证联盟，发布汽车软件升级技术等 5 个认证实施规则，助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更好地满足东盟市场需求。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广西将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大力实施“小而美”的质量和标准海外应用推广项目，拓展与东盟国家质量共建共享共研机制，推动进出口贸易质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等环节有效衔接，助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来源：中新网）

鲁班工坊助力中柬职教合作，培养技能人才——“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

位于金边的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有一座7层的现代化教学楼，澜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暨柬埔寨鲁班工坊就设在这里。记者采访时招生考试正在进行，教学楼里聚集着不少学生。柬埔寨鲁班工坊负责人吉特·雷乌特说：“学生们都知道这里教学质量高，就业有保障，近年来我们的招生规模屡创新高。”

柬埔寨鲁班工坊于2018年在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支持下正式成立，近年来已成为柬埔寨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平台。“鲁班工坊为柬埔寨年轻人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院长本·佩伦说。

目前，柬埔寨鲁班工坊围绕机电一体化技术、现代通信工程两个核心专业进行职业培训和学历教育，后续将增加旅游管理和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专业，进一步契合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鲁班工坊项目负责人向记者介绍，柬埔寨鲁班工坊以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式为主线，注重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已建成22间理论与实训一体化教室，配备近2000台设备和500余个实训工位。目前，柬埔寨鲁班工坊累计已为当地培养学历教育学生3700余人，培训社会人员900余人，还面向泰国、老挝等周边国家开放，吸引澜湄国家留学生逾百人。

“我教过的学生里已有多人被中资企业录用，他们职业前景广阔，让我很自豪！”来自柬埔寨磅湛省的中柬联合教学团队骨干陈美琳说。柬埔寨鲁班工坊把培养柬方“种子教师”作为重点任务，选派优秀教师赴华进修，如今已有多名柬籍教师获得高级职业资格认证。

柬埔寨鲁班工坊还承担澜湄国家师资培训，截至目前已培训来自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等4个澜湄国家18所高校的教师94人。

“鲁班工坊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澜湄合作机制下的重要成果，为柬埔寨和整个区域持续输送高素质技能人才。”吉特·雷乌特表示，“我们希望把它打造为澜湄国家技术合作的‘金字招牌’。”（来源：中国—东盟中心）

中国与东盟十国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5月20日，中国—东盟经贸部长特别会议以线上方式举行，双方经贸部长共同宣布全面完成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谈判。

3.0版谈判于2022年11月启动，历经近两年时间、9轮正式谈判，于2024年10月实质性结束。在各国经贸部长全力协调和共同推动下，双方全面完成谈判，向签署升级议定书的目标又迈出关键一步。

3.0版将发出维护自由贸易与开放合作的强音。中国与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和重要投资伙伴，均是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3.0版建设作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优先事项，是双方共同维护和深化自由贸易的标志性成果。在全球经贸面临重大挑战的形势下，双方全面完成谈判，顺应了世界发展大势，彰显了自由贸易与开放合作的强大生命力，将为区域和全球贸易注入更大确定性，为各国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3.0版将打造包容、现代、全面、互利的自贸协定。3.0版包含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联互通、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竞争和消费者保

护、中小微企业、经济技术合作等 9 个新增章节，有利于双方在新形势下推进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有力促进双方供应链深度融合，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

3.0 版将有力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与东盟作为两大发展中经济体，通过自贸区 3.0 版建设共同扩大相互开放，全面扩展新兴领域和新质生产力合作，将为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超大市场提供重要制度性保障，为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促进双方共同繁荣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下一步，双方将积极推进各自国内签署批准程序，推动年底前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来源：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 国别研究

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变迁与发展趋势

方芸

(方芸,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老挝问题、跨境民族、东南亚历史与文化)

摘要: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 华人社团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华人社会的兴衰; 华人社团是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的主体和依托, 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的发展状况直接反映华人社团的地位和作用;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及华文媒体三位一体, 支撑着海外华人社会的存在、延续与发展。随着中国与老挝政治经济关系的恢复, 中老两国合作领域的扩大和深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 20 多年来, 为着不同目的、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老挝的中国新移民急剧增加, 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新移民的数量超过老侨, 进而成为促进老挝华侨华人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要素之一。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恢复和新建, 带动了华文教育的兴起和华文媒体的涌现, 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的同时, 华侨华人社团的组织和功能不断扩展, 新老华侨华人社团并存发展, 共同推动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是海外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 华人社团的发展状况反映了华人社会的兴衰; 华人社团是华文教育与华文媒体的主体和依托, 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的发展状况直接反映华人社团的地位和作用: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及华文媒体三位一体, 支撑着海外华人社会的存在、延续与发展。随着中国与老挝政治经济关系的恢复, 中老两国合作领域的扩大和深化, 进入 21 世纪以来的 20 多年来, 为着不同目的、通过各种途径前往老挝的中国新移民急剧增加, 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迅速扩大, 中国新移民的数量超过老侨, 进而成为促进老挝华侨华人社会发展与变迁的要素之一。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的恢复和新建, 带动了华文教育的兴起和华文媒体的涌现, 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传统得以保留和延续的同时, 华侨华人社团的组织和功能不断扩展, 新老华侨华人社团并存发展, 共同推动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

一、老挝华侨华人社团: 传承与延续

(一) 华侨华人社团的源流

相对于东南亚其他国家, 老挝华侨华人人口数量相对较少, 社团组织相对单一。追根溯

源，按籍贯成立的各个帮公所是老挝最初的华侨社团组织形态。帮公所产生于越南阮朝嘉隆帝时期，嘉隆帝为感激华侨对其统一越南的支持，于1814年特许华侨按籍贯、方言、习俗的不同，分帮自行管理。各帮公所设正副帮长各一人，由帮民公开推举产生。通过正副帮长发挥对内管理以及上下和内外信息的承转，各帮公所实行有效的自治。法国统治越南老挝了柬埔寨三国后，沿用帮长制，分帮管理华侨。

老挝老侨主要来自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其中潮州籍最多，其他籍贯人数多少不等，没有像越南、柬埔寨华侨社会那样形成五帮。因此，老挝各省帮公所的设立，主要根据当地华侨各籍贯人数的多少，设立一个或两个帮公所。万象设有潮州公所和客帮公所，为数不多的其他籍贯的华侨全部加入客帮公所。琅勃拉邦设有潮州公所和海南公所，川圹设有广府公所和云南公所，巴色设有潮州公所和客帮公所，沙湾拿吉和他曲设有潮州公所。帮公所帮长的对外职责是为当地政府传达政府政令，代为收缴居留税、商业牌照税，代帮民申请各种许可证，办理出入境事务等；对帮内则负责解决纠纷修葺公共场所、救济难民等事务。1934年，万象各帮帮公所合并为一，取名华侨公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政府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更改华侨社团名称，即以“中华理事会”取代“帮公所”的要求，法国殖民当局同意，并于1948年9月28日由法国驻越南高级专员下令将华侨公所改称为中华理事会。万象、琅勃拉邦、川圹、巴色、他曲等地均有设置。中华理事会实行监理事制，设正副理事长、正副监事各1人，职责与前各帮帮长基本相同。理事、监事均由原各帮侨民大会推选，名额依当地华侨、华人人数多少而定，任期2年，可连选连任。虽然名称有变，但中华理事会职能与管理制度的实质性改变，只增加一条，即理事长人选必须经中国领事馆同意以加强中国政府对老挝华侨华人的管理，强化华侨华人与祖籍国的联系。

1959年，老挝政府下令取消中华理事会，拟以中华会馆代之，对华侨社团进行改组。1959年10月28日，改组后的第一个华侨社团——万象中华会馆成立，该会馆的宗旨是联络华侨、华人感情，维护同胞福利，但不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老挝华侨华人，不分男女，年满18岁，均可入会。根据万象中华会馆组织章程，会馆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下设理事会，设理事长1人，副理事长2人，理事25人。政府监事长1人，监事5人。理事会下设总务、财务、交际、康乐4个组。1960年后，参照万象中华会馆的组织结构，琅勃拉邦、川圹、百细、他曲等地相继设立了中华会馆，各地中华会馆的主要活动有：主持华侨坟场，救济安置各种天灾人祸造成的难侨，为难侨募捐等。

1988年，中老两国恢复互派大使，双边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双边关系快速改善，老

挝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及其活动得以恢复，功能不断完善，老挝各地原有的中华会馆或是华侨理事会等社团组织均改名为中华理事会，新成立的侨社也冠之以中华理事会之名。在万象之外的其他华侨华人集中的城市都成立了中华理事会，包括沙湾拿吉中华理事会、占巴塞中华理事会、川圹中华理事会和琅勃拉邦中华理事会等，中华理事会成为老挝华侨华人社会重要的社团组织。

老挝华侨兴办华文教育始于 20 世纪初，广大侨胞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和保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慷慨解囊，捐资办学。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老挝全国有华文学校 20 多所，万象的都学校学生最多时有 5600 人，巴色、沙湾拿吉、他曲、琅勃拉邦、川圹等地华校的学生人数也超过 1000 人 20 世纪 70 年代末，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国初期，老挝政府允许续办的华文学校仅有万象察都中学，其余华文学校均被强制停办，华文教育落入低谷。

(二) 华侨华人社团传统的延续

传统的老挝华侨华人社团是散布于主要城镇的中华理事会，各地的中华理事会规模大小不一。中国新移民到来之前，中华理事会是老挝唯一的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但一直没有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机构。老挝全国各地的中华理事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各地中华理事会的结构和功能基本一致，唯有辖区范围大小和华侨华人数量差别。如前述，尽管经历了诸多波折，中华理事会仍然发挥了维护华侨华人权益、维系群体内部稳定与发展的作用。通过对万象中华理事会的宗旨、机构设置、组织管理、功能的考察，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基本状况可谓了然。

中华理事会的宗旨是维护和保障华侨华人利益。围绕其宗旨，中华理事会的具体任务包括：筹资兴办教育，管理学校；发展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开展互助自救，解决各种困难；协助当地政府贯彻实施有关法规，以确保华侨华人遵纪守法；处理华侨华人社团内部事务，促进侨胞团结；以及沟通侨胞与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的联系等。长期以来，老挝各地中华理事会一方面为广大华人做了大量实事好事，如积极发展华文教育事业、传播中华文化等；另一方面，增进华人与当地各族人民和政府的友好关系，帮助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因此老挝各地中华理事会得到了广大华人的支持和当地老挝人民的赞许以及老挝政府的认可。

理事会是万象中华理事会的组织管理机构，每届理事会由 15 位委员组成，其中理事长 1 位、副理事长 5 位，监事长、组织主任各 1 位。万象中华理事会定期召开年度工作总结会议，由理事长和各机构负责人向大会报告本年度的工作情况及财政收支情况，并报告次年及后年的工作计划，并报请大会审核。每届委员会任期 3 年，换届选举由中华理事会会员领取选票进行无记名投票，根据票数多少先选出 15 名委员，再从 15 名委员中选出理事长副理事

长、监事长等。在投票选举日及选举过程中，老挝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中国大使馆的领导到场指导监督，保证选举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新一届委员会成立后，即呈报老挝中央建国阵线及有关部门和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备案。

万象中华理事会下设机构有：察都公学董事会、永珍善堂常委会、福德庙委员会、伏波庙委员会、中华妇女会、中华少狮团、察都公学校友总会、德教会紫珍阁委员会、察都公学修校委员会和万象华侨各区区长联谊会。这些机构都在理事会领导之下，但都有各自的领导班子和工作计划和程序，有自己独立的财务核算，定期向理事会和华侨华人社团汇报工作情况及财务收支情况。永珍善堂是华人慈善福利机构，其职能是帮助料理贫困的华侨华人、老挝人及其他外国人的后事，收养一些孤寡老人。每年盂兰盆节等传统节日永珍善堂均举行慈善捐助活动。而伏波庙不仅是华侨华人宗教信仰的实践场所，而且成为日常生活中联络朋友、亲朋集会的主要场所。

二、21 世纪以来老挝华侨华人社团：扩展与重构

2000 年之前，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形式单一，仅有分布于各地、各自独立的中华理事会。2000 年以来，随着中国与老挝经贸合作的发展，快速增长的中国新移民不仅意味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的构成，为老挝华侨华人社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华侨华人社团的相继成立和快速发展，促使老挝华侨华人社会在延续传统中发展。

(一) 中国新移民的概况

随着中国与老挝经济贸易关系的恢复与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老挝经商，其中不少人长年居住在老挝。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新移民开始前往老挝经商定居，老挝华侨华人多从事小型的工商业活动，如批发、零售、进出口贸易等，虽然大部分经营规模较小，但商业网点不仅集中于万象、琅勃拉邦、沙湾拿吉等中心城市，而且散布于偏远的村镇，从而构成有机的商业网络。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主要来自云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广西等省份，以湖南、云南、安徽三省的人日古多数，在湖南人子献甲版仕版们中，又以邵东人为主。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老挝吸引了来自中国的大量投资，中国与老挝在农业、交通基础设施、电力、矿产、加工制造、金融等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在对老挝投资的 53 个国家中，中国的投资总额居首位。截至 2023 年 10 月，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的项目共计 900 多个，投资总额达到 160.7 亿美元，对促进老挝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当地民众就业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投资增加，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人数急剧增加，但其准确数量是不可知的，这是

因为老挝政府相关部门对外籍人口缺乏有效管理，加之对合法入境、非法滞留的新移民的数量难以掌握，所以关于老挝中国新移民的人数缺乏权威统计。根据庄国土教授调查数据，截至2004年，在万象的中国公民有1万多人，其中湖南人约8000人。范宏贵在实地调查中发现1975年以前老挝琅勃拉邦大约有华侨华人1.5万人，基本上是广东人和海南人，而1999年琅勃拉邦的华侨华人有3000人左右，其中95%都是近年迁入的云南人。据万象中华理事会负责人估算，20世纪80年代至2012年，到老挝做生意、谋生的中国人至少有25万人。同一时间，笔者从老挝中国商会湖南分会负责人处了解到的情况是，2012年在老挝的湖南人约有4万人。31989~1994年磨憨口岸开通前，以邵东人为主的湖南商贩在老挝自北向南地流动摆摊，并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以邵东人为主的“老挝帮”的地域分布格局。2015年，湖南商会公开表示在老挝的湖南人已经达到10万人居在老挝的各省中国人之首。

庄国土依据出国目的、途径和职业结构，将中国新移民分为留学生、非熟练劳动力、商务移民和劳务输出人员四种类型，其中商务移民包括投资移民、驻外商务人员和各类商贩。在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以商务移民为主，即在老挝投资的国有企业各级管理者、在老挝经商或开设工厂的中小企业主经营餐饮及批发零售等行业的个体老板，以及到老挝投亲靠友的打工者。若按王赓武提出的四种中国海外移民形态类型来看，在老挝的新移民则可分为华商形态和华工形态。

(二) 各类华商会相继成立

各类华商会的涌现，反映了华侨华人在居住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在祖籍国与居住国关系中突出的作用。2000年以来，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超地缘、业缘和血缘的社团组织的成立，包括中国总商会和中华总商会。

1. 老挝中国商会(2019年更名为老挝中国总商会)

经中国商务部批准备案、在老挝依法注册等一系列程序，2005年11月16日，老挝中国商会正式成立。老挝中国总商会是以在老挝的中国新移民为主体的、自律性的和非营利社团组织，代表中资企业利益，维护中资企业权益，在老挝依法注册的中国独资公司、合资公司以及代表处均可自愿参加。老挝中国总商会在老挝国家工商会的领导下和驻老挝中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商会的功能包括：扩大和提高中资企业与老挝的经贸合作和合作质量；增进中资企业与老挝政府部门及工商界的沟通交流；代表中资企业对外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指导和协调会员企业在老挝合法经营、公平竞争，树立中国企业和中国人的良好形象；推动在老挝中国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协商解决有关中国企业之间的重大经营问题。

从“走出去”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进驻老挝的中资企业越来越多，随着商会成员的增加、功能扩大和地位的提升，为保证商会有序、有效运作，促进商会的发展，老挝中国商会在既有总章程和老挝相关法律的基础上修订了商会章程。2019年12月30日，老挝中国总商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将“老挝中国商会”更名为“老挝中国总商会”，会员大会集体审议并全票表决通过了《老挝中国总商会章程》。

老挝中国总商会成立以来，规模迅速扩大，下设分支机构不断增加，所属分支机构依据老挝法律法规和总商会章程注册设立，在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以分会的名义开展工作。目前老挝中国总商会下设分支机构16个其中同乡类分会11个，即浙江分会、湖南分会、江西分会、福建分会四川分会、广东分会、云南分会、广西分会、陕西分会、河南分会和山东分会；地区性分会3个，包括老挝中国总商会琅勃拉邦分会、老挝中国总商会川圹分会和老挝中国总商会巴色分会；以行业划分的协会2个，即老挝中国总商会摩托车协会和老挝中资发电企业协会。各分会现有会员单位总计88家，注册会员超过5000名，涉及农林渔、建筑建材、房地产金融证券、医药、冶金矿产、石油化工、水利水电、交通运输、信息产业、机械机电、轻工食品、安全防护、环保绿化、旅游休闲、电子电工家居用品、商品批发零售等具体行业领域，在促进中老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老挝中华总商会

不同于老挝中国总商会，老挝中华总商会是一个以老挝传统华侨华人社会为基础，孕育于老挝传统华侨华人社会的、全国性的华侨华人商业社团。

2011年，时任万象中华理事会理事长林振潮、组织主任李龙及姚宾等发起倡导成立“老挝华侨华人商业联合会”，旨在把各自经营的华侨华人商业人士联合成一个有规模、有实力的商业团体，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在老挝各地中华理事会及侨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经过4年多的酝酿，老挝中华总商会于2015年7月29日正式成立。

老挝中华总商会是由生活、定居在老挝的华人华侨商业人士组成，并报请老挝工商及有关部门批准的非营利性民间商业团体。老挝中华总商会下设会员大会和执委会，执委会成员包括会长、执行会长、常务副会长和秘书长等。

老挝中华总商会以促进老挝工商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教育与社会服务为宗旨，加强老中两国企业和民间商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与发展。老挝中华总商会的职能包括：及时向会员通报老挝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商业投资动向；协助办理政府有关部门、中国大使馆、各地中华理事会及侨团委托的事项；以总商会的名义组织会员和老挝工商界及各国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扩大业务范围，做到资源共享、利益共赢；积极参加中国侨办、侨联等部门所

举办的各类商业投资洽谈会、博览会、交易会等活动，帮助会员开阔视野，增强市场营销观念；维护和保障会员的合法权益，公正处理本会会员与有关企业之间所发生的经济及商业纠纷。

老挝中华总商会的成立为促进在老华商之间的商业合作搭建了新平台在推动和谐侨社建设、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老经贸合作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

(三) 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应运而生

2000年以来，随着中老两国合作的广泛深入开展，老挝掀起汉语学习的热潮，华文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遍布老挝全国各地，以华文学校为主体的华人社团组织——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应运而生。

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创办于2017年12月，是在老挝教育部私立司领导下，由老挝全国10所华文学校共同组成的教育协会。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的主要宗旨是：统一老挝全国华文学校的教学内容，提高华文教育的教学水平，使老挝全国的华文教育能够同步进展。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的成员包括万象察都公学、万象中老友谊学校、琅勃拉邦新华学校、琅勃拉邦中华学校、乌多姆赛寮北学校、乌多姆赛老中友谊学校、波乔程自德华文学校、琅南塔寮龚华文学校、他曲寮东公学、百细华侨学校和沙湾拿吉崇德学校。联合会设会长1人，常务会长2人，副会长7人，秘书长1人，以及负责日常事务和财务工作的办公室。会长由万象察都公学董事长兼任。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目前设有各所华校品学兼优贫困学生奖金以及贫困教职工的生活补助金等慈善项目。

2000年以来，以新移民为主体的老挝中国总商会、脱胎于各地中华理事会的老挝中华总商会和将新老华文教育机构兼收并蓄的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的相继成立，使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变迁呈现扩展和重构特点。不论是扩展还是重构，都是华侨华人作为祖籍国和住在国的“中间地带”，在中国与老挝国家关系中因时而动、因势而为、顺势而行的选择，其功能较传统社团组织有所突破和扩展。其一，在继承了传统华侨华人社团内部帮扶、互助和联谊、帮助新移民融入当地的一般性功能的同时，商业取向明显、政治政策关怀增强和中华文化传播功能突出。中国总商会和中华总商会的相继成立本身就是老挝华侨华人社团功能突破和扩展的结果，都以参与老挝经济建设和促进中老商贸和投资合作作为商会的主要目标，并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助力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其二，在组织架构、商会管理上更加成熟通过规范管理系统、入会方式、会员范围、会员权利和义务，以及章程的颁布建构族群身份认同。其三，新移民社团具有超地域、超血缘的特征，其地缘性更为广泛，非传统侨乡地区的地缘性社团大量涌现，较之传统侨乡地区的地缘性社团也呈后来居上之势。与此同时，依

居住国的住在地地缘纽带而组建的社团也不断涌现。

三、老挝华侨华人社团在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参与与贡献

中国和老挝于 2016 年首次在联合声明中阐明中老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019 年 4 月,中老两国最高领导人签署《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经过 5 年的实践,中老命运共同体意识落地生根,以实践证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国利益紧密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2023 年中老双方续签并实施新的 5 年行动计划,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行稳致远。无论是全球层次上、地区层次上还是国家层次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概念性的想象共同体,又具有实践中的过程共同性”。从中老双方明确提出共同构建双边命运共同体愿望到行动计划的出台和具体实施,中老命运共同体不再停留于概念的构想,而是推进到构建的实践阶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华侨华人既是重要的参与者,又是受益者和贡献者。因此,作为老挝华侨华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团组织,在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共建中,是不容忽视的实践者和贡献者,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商会充当经贸合作桥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中老经济共同体

老挝各商会与中国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建立不同层次、多种模式、常规性投资和商贸交流平台,包括对话会、研讨会、投资推介会、商业调查等有效提升了中国与老挝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居住国、祖籍国和社团会员的三赢,促进中老经济共同体的构建。

老挝中国总商会成立以来,发挥在地优势和纽带作用,践行服务职能连续承办了七届中资企业与老挝政府对话会,总商会紧密对接中资企业和老挝政府相关部门,精心组织来自交通、电力、矿业等合作领域的中资企业与老挝政府计划投资部、公共工程运输部、工业贸易部、能源矿产部等部委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在回顾和评价中老务实合作的成就和进展的同时,针对中资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共同努力寻求解决方案,有效增进了老挝中资企业与老挝政府部门及商界的交流和沟通。

老挝中国总商会下属各个省分会不仅是联系海外本籍华商的平台,还是中国地方政府在当地的商务代表处,发挥对外商贸和招商引资的职能。

老挝中国总商会各省分会发挥民间外交功能,立足本省,助力省级地方政府和企业与老挝的交流合作。成立于 2008 年的老挝湖南商会发挥在老挝深耕多年、熟悉老挝当地政商环境的优势,为湖南省开展与老挝的合作牵线搭桥,助力湖南省与老挝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旅游等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2015 年长沙-万象直航航线开通;2016 年和 2017 年,湖南省与老挝万象市和乌多姆赛省分别签署缔结友好关系意向协议;2017 年 12

月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落成。老挝湖南商会在其中发挥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老挝云南商会充分发挥“两地熟”优势，主动承载云南省和老挝“经济大使”的使命；强化“一手抓引进，一手抓落地”商务功能，承办2020年中老经济走廊智库对话会视频会议，负责老挝磨丁经济特区招商工作。

在中国设立商会固定联络处，成为商会与中国政府部门和国内企业进步密切联系的积极措施。2023年4月，老挝湖南商会在湖南设立驻湖南办事处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商品展示中心，这为增进老挝与湖南的商贸往来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服务，同时也为湖南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一个了解老挝、开展投资及贸易等方面合作的新平台。

老挝广西商会会员企业和个人在老挝经商人数多达万人，涉及农林种植加工、茶叶、旅游等多个领域，老挝广西商会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之间形成互为支持、合作共赢的关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可以从资金、技术、人才培养、老挝农产品出口到中国国内等方面支持老挝广西商会，老挝广西商会为广西企业和科研院所在老挝投资农业项目和开展科技合作争取更多便利和优惠。为提振疫情后会员企业在老挝农业领域的合作，老挝广西商会和老挝农林部共同举办“新时期老挝农产品投资、种植、深加工、营销(输华)研讨会”。老挝17个省(市)农林厅负责人、老挝各省农业企业及老挝中国总商会广西分会代表等共同参会，就新时期老挝农产品在投资、种植、深加工和营销等政策和管理方面展开广泛讨论、交流意见，直面当前挑战并深入研讨对策，将有力推动疫情后老挝农产品对华出口，提振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信心，促进中老经贸合作稳步发展。

2. 发挥华侨华人社团和华文媒体的双重文化优势，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风险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形成了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这一全球价值观包含互相依存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共同利益相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彰显了联合国宪章精神，符合中西方文化共同追求和人类社会和平发展大势。”“在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利益关切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对此理解和认知标准不统一，认知态度和关注度存在不同区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海外传播必然面对跨文化的客观差异性。”在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无论是作为个体的华侨华人，还是作为组织的社团，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他们通过参与中老经济、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尽管身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仍旧保持着与祖籍国的跨国联系，广泛地实施跨国活动，建构起跨国网络，并展现出‘宗乡文化’与‘本土认同’的双重认同形态。同时，华侨华人作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资源，他们拥有双重文化的优势。因此，可发挥华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的多重文化优势和平台功能，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老挝的华侨华人是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民间话语主体，华文媒体和华文学校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渠道。老挝华文媒体以新媒体为主，包括《益友园》和《中国时报》电子版、老挝中国总商会微信公众号老挝中华总商会微信公众号，以及老挝通、老挝资讯网、掌中寮等微信公众号，这些新媒体既是老挝华侨华人重要的信息来源，也是与不同文化沟通的媒介；它们除了报道当地华侨华人生活之外，还关注老挝和中国的投资经贸、文化交流信息，成为老挝华侨华人重要的信息来源，在传递两国信息和文化的同时，传播不同文化，分享和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一是华文媒体通过信息和文化交流的多元渠道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冠疫情期间，《中华时报》、老挝资讯网等老挝华文媒体对中老两国疫情及防疫政策措施的及时、客观、全面的报道，反映了中老两国面对突发危机事件，休戚与共、命运相关的价值理念，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意识也在潜移默化中传递。

《中华时报》与《人民日报(海外版)》签约，共同把《中华时报》打造成为在老挝及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媒体。2020年6月16日，由中国经济信息社(以下简称“中经社”)与老挝中华时报社合作打造的“新华丝路”双语信息专栏，在老挝《中华时报》多语种移动客户端上线，以本地化传播方式满足老挝受众对中国经济信息及“一带一路”相关信息的需求该专栏采用老挝语和英语两种语言，重点发布“一带一路”经济信息、中老两国双边合作成果、中国—东盟金融信息、中国企业“走出去”案例等内容，为老挝政府、企业、媒体了解中国经济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窗口，为中国企业赴老投资、与当地企业开展合作搭建平台，为助推中老两国友好、中老人民民心相通架设桥梁。

二是客观、全面、正面地报道中国，批驳各种不当甚至荒谬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舆论，促进当地主流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和评价更为合理和理性。

三是华文学校发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渠道作用，一方面向海外华裔开展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为所在国培养懂汉语的人才。在老挝中老经贸合作的扩大和深化掀起了老挝当地人学习汉语的热潮，华文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成为在老挝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渠道之一。

3.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夯实中老命运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和民意基础

老挝华侨华人主动融入当地社会，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发挥企业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服务，回馈当地社会，增进民心相通。老挝中国总商会积极参与老挝政府和

中国驻老挝大使馆组织的重大活动，参与救援和赞助阿速坡水灾，参加中国驻老挝大使馆领事保护工作，接待中国国内各类团组并举办座谈会，参加各类性质的对话会、洽谈会、展销会等。

老挝中国总商会获悉万象市巴俄县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工程项目缺乏建设资金的困难后，向各会员单位、中资企业发出倡议，希望大家积极参与助力老挝国家教育和扶贫事业的建设，老挝中国总商会、中国总商会湖南商会中国银行(香港)万象分行、中国工商银行万象分行、中国电建海投南欧江流域发电公司等 18 家商会、企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以缴纳特别会费的方式，筹集资金 17.6 亿基普，捐赠给巴俄县作为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工程项目建设经费，助力万象市职业教育发展。

2021 年 1 月，老挝北部地区经历极端气候，气温低于正常年份，严重影响了老挝北部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寺庙学童缺少御寒物资，急需紧急救援，老挝云南商会组织“迎新春送温暖”活动，3 天内共筹集到毛毯 1250 条，方便面 645 箱，服装 300 件等，为在琅勃拉邦 3 所寺庙学校就读的大约 1170 名学生筹集了总价值约合 156 亿基普的御寒生活物资。与此同时，老挝云南商会还协助云南省政府机构和公益组织与老挝政府联络和对接，帮助中资企业的各类捐助或资助活动顺利进行。

四、老挝华侨华人社团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整合与联合

老挝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在中老国家关系中的沟通功能和桥梁作用具有突出的政策实践和时代意义。吴前进指出：“在国家关系的互动中，华侨华人和华族又被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限定，其角色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有特征，内中既有‘有所作为’的一面，也有‘无可奈何’的一面，具有不同的时空意义。”中老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快速推进，给予老挝华侨华人社团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挑战，老挝华侨华人社团把握机遇，“有所作为”；但面对挑战，并非“无可奈何”，正视、探索和行动应是老挝华侨华人社团持续发展的方向。

首先，老挝华侨华人社团面临社团内部以及社团之间资源整合的挑战。老挝华侨华人社团数量不多，但同质性高，无论是商会还是教育联合会，要有效发挥社团的作用，实现社团的宗旨，都面临着整合资源和凝聚华侨华人力量、增强社团吸引力的挑战。

挑战之一，分别代表新老移民社团之间资源的整合与联合。新移民与当地生长的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既有合作，也有竞争，这种现象是中国和平发展对东南亚华人社会产生影响的结果之一。这种复杂关系也困扰着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老挝中国总商会和老挝中华总商会的会员来源各有侧重，拥有不同的资源和优势，它们与老挝当地社会以及中国的互动

模式也有所不同，它们之间存在合作和竞争，统筹两个商会的力量难度较大。

截至 2023 年 10 月，老挝中国总商会有 88 家会员单位，注册会员超过 5000 家，涉及农林牧渔、建筑建材、房地产、金融证券、医药、冶金矿产石油化工、水利水电、交通运输、信息产业、机械机电、轻工食品、安全防护、环保绿化、旅游休闲、电子电工、家居用品、商品批发零售等具体行业领域。几乎覆盖了老挝经济建设和中老合作的所有领域。根据老挝中国总商会章程，“凡经老挝工贸部或其他政府部门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或组织，或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合法身份证件)的个人在老挝注册设立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或代表处、办事处、个体工商户、协会、联谊会等”，都可以成为会员，老挝中国总商会会员主要代表了新移民。第六届老挝中国总商会的 7 个会长单位和理事单位均为新移民的企业。老挝中国总商会及其下属分会与中国政府机构之间形成联系密切的双向互动关系，以祖籍地地缘成立、以祖籍地命名的各个分会，成为祖籍地政府、企业与老挝政府及商业企业联系的桥梁，推动祖籍地与老挝当地的投资贸易，并从中获取商业机遇，如老挝中国总商会湖南分会、云南分会等。老挝云南商会的宗旨是“凝聚乡情，整合资源，自愿互助，共同发展”，围绕云南省服务和融入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实施方案开展工作。

老挝中华总商会的会员主要由在老挝定居的华人华侨组成，并吸收已在老挝投资经营多年、遵纪守法的华裔商业人士。老挝中华总商会执委会的构成相对复杂，既有老侨侨领，也有新侨侨领；有的同时兼任各地中华理事会负责人，有的同时兼任老挝中国总商会及其分会负责人。与祖国的贸易关系和实质性的联系是新侨和老侨侨居老挝的基础，但是老移民经济实力的培育有更广泛的居住国的社会基础，一旦他们将这种社会基础与来自祖籍国的经济能量结合起来，其经济地位必将获得空前的提升和增强。

“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内各级政府不同程度上都鼓励企业‘走出去’，华侨华人社团就成为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的海外资源。”随着中老共建“一带一路”和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中国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华侨华人社团与祖籍地的关系，促进和实现代表新老侨的社团之间的资源有效整合，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华侨华人社团在中老两国关系中的积极作用。

挑战之二，凝聚新老华侨力量、增强社团吸引力，实现社团联合。庄国土研究了 21 世纪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状况后指出，东南亚华侨华人社团的联合有待于进一步增强。老挝华侨华人社团不多，但构成复杂，同样面临着新侨老侨社团、不同地域社团之间纵向和横向的联合挑战老挝中国总商会以总商会和分会的形式实现了中国省籍新侨团体和住

在地地缘社团的横向联合，老挝中国总商会下属分会既有以原居地地缘设立的分会，如湖南分会、云南分会等，也有以住在地地缘设立的分会，如巴色分会等。老挝中华总商会是在整合具有数十年历史的老挝各地中华理事会的基础上成立的老侨社会的第一个商业侨团；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以联合会的方式，促成老挝全国各地较有影响的华文学校的联合。老挝中国总商会、老挝中华总商会和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从组织架构上实现了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初步联合，但在增强社团凝聚力和吸引力方面，仍面临着诸多挑战。

老挝中国总商会成员构成复杂、规模不一、实力悬殊，但如何增强商会吸引力、凝聚会员力量是社团所面临的挑战之一。老挝中国总商会注册会员超过 5000 家，会长单位和理事单位包括中国银行(香港)万象分行、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老挝公司、云南建投国际工程部老挝区域经理部、中国工商银行万象分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有限公司老挝分公司、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老挝公司、湖南炫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老挝的中资企业中，这 7 家单位的实力和影响力具有代表性，包括这 7 家会长单位和理事单位在内的中国央企、国企和有实力的民企对商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更多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在老挝的中国企业中，实力强的大型国有企业数量有限中小型民企次之，数量最多的是小微民企。如何增强商会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同样关系到商会功能的有效发挥。邓应文通过对越南中国商会的研究发现，中国商会对中小企业的吸引力不足，被中小企业视为国企的“俱乐部”。笔者在对老挝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在老挝万象和琅勃拉邦的 72 个中资企业中，大型企业占比约 22%，中小型企业占比约 78%，在调研对象企业中，加入老挝中国总商会和没有加入老挝中国总商会的企业各占一半，没有加入商会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加入商会对其在老挝的经营和发展意义不大，但是，中小企业所代表的新移民数量更大在老挝的分布更广，其资本、商品和技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大，因此在中老关系中的影响不亚于大型企业。因此，老挝中国总商会通过为更多的会员提供各类政策资讯、业务咨询、市场推介和法律服务，维护中小会员权益和提供处理问题建议，将大大提升商会的声誉，增强商会的吸引力，进而凝聚在老挝的华侨华人力量，促进社团的联合。

凝聚华侨华人社团，增强社团的联合，还应该避免各个社团形成小圈子。老挝全国性的华侨华人社团不多，但在全国性的社团之下，“以原居地或住在地为基础的双向延伸”的地域性社团遍布老挝。老挝中国总商会下设包括同乡性分会、地区性分会和专业协会在内的 16 个分支机构。老挝中国总商会下属部分分会又成立了次一级的分会，如广西商会设有南部分会福建商会下设宁德分会，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下设老挝北部华文教育联合会。老挝国土面积不大，但发展的地域性差异明显，北部、中部和南部与中国的合作存在明显的地域性

差异，老挝中国总商会以住在地为基础的分会和次一级分会的设立，也是这种发展不平衡的反映。无论是老挝中国总商会还是老挝华文教育联合会及其下设的分会，不仅表现为组织形式上的联合，而且也在地处偏远、势单力薄的投资创业企业提供了一个归属感更强的组织。但是，这种联合下的子集式的分会有可能因为地域差异等而形成小圈子。因此，克服地域的差异，避免形成小圈子，才能有效统筹各个商会的力量，形成合力，从形式和内容上实现社团的联合。

纵观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历程，其角色和作用在中老两国关系的互动中被赋予了时代意义。20世纪80年代中老关系正常化和快速发展，使老挝华侨华人社团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21世纪以来，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经过扩展和重构，经济功能和文化功能日益突出，在中老合作中发挥沟通、融合作用，助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挑战与机遇并存，正视社团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整合资源、增强联合，不仅是老挝华侨华人社团共同面临的挑战，更是老挝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方向，只有进一步的联合，方能更好地为华侨华人服务，凝聚老挝华侨华人力量，充当好中老友好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本文来源：周边外交研究**）

◎ 热点分析

“中国东盟+”——全球跨区域合作的一种模式探索

首届中国—东盟—海合会峰会将于5月28日—29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这意味着2025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提出的“构建东盟—中国—海湾三角增长极”倡议得到中方认同,也释放出中国东盟合作从“东盟+”向“中国东盟+”的全球新型跨区域合作模式演进的积极信号。

从“东盟+”向“中国东盟+”扩展

1999年东盟扩至十国以来,“东盟+”机制通过“10+1”“10+3”等框架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联系起来,形成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范式。如今,“中国东盟+”跨区域合作模式则是在国际局势动荡转型的关键时期,以“东盟中心地位”为锚点,以“东盟+”为基础,从中方参与现有“东盟+”机制转向以中国东盟合作为基轴和枢纽,主动链接其他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比如现在的中国—东盟—海合会等,构成一个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跨区域合作网络。

这样不仅进一步巩固“东盟+”地位,还将通过“中国东盟+”搭建的更多小三边框架,推进参与主体之间的“五通”。在当前全球治理失序的大背景下,这可以为由东盟主导的现有机制注入崭新动能,有助于将中国东盟合作的示范效应向着更大范围扩散,进而为世界探寻一种新的稳定框架,形成新型全球合作模式。例如,在中国—东盟—海合会架构中,东盟国家的橡胶、棕榈油等自然资源禀赋与快速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国的全产业链能力、巨大投资空间和14亿多人口超大规模市场,与海湾国家的资本配置之间相互契合和互补,可以释放“1+1+1>3”的效应,并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探索全球跨区域合作新模式

这种新型跨区域合作的底层逻辑,在于中国与东盟的良性互动自然会向更广泛的三方关系扩展或位移。支撑这种模式创新的相关因素构成有机整体,使“中国东盟+”成为新型全球跨区域合作的一次有益探索。

一是开放多边主义的实践经验提供了制度路径参照。中国和东盟各自基于开放多边主义的成熟实践,为构建“中国东盟+”跨区域合作网络提供了逻辑自洽的可行性框架。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共建国家或区域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逐步形成东西联动、陆海统筹、辐射全球的多边合作网络。东盟则以“开放区域主义”为指导,建立向其他国家开放的东亚合作系列领导人会议等

战略沟通机制，构建包容性的区域合作架构。2019年，第34届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印太展望》报告中说，东盟可以酌情寻求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其他区域、次区域机制在特定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基于此，“中国东盟+”模式是将双方成熟的跨区域合作经验进行战略叠加，通过制度、规则、资源等的互鉴互通，为动荡中的全球治理提供可复制的多边主义合作范式。

二是共同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全球治理需求成为现实驱动。当前美国政府的“交易型外交”将国际关系简化为短期利益交换，“美国优先”原则下反复无常的政策举措直接冲击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秩序，加速全球多边体系的碎片化，为全球治理带来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本已严重的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加剧。当前，广大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北方国家亦需应对单边主义引发的规则真空，无论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都需寻找多边主义的未来，回答“世界走向何方”的变局之问。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以中国和东盟一贯的平等、包容等原则推动非对抗性制度合作，实现多边主义升级，渐进形成区域间互联互通、互利共赢的新模式，促进自然而合理的世界秩序变革。

三是顺应从“区域化合作”向“区块间互联”演进的历史趋势。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化合作，即依托欧盟、东盟、非盟、南美国家联盟等既有结构建立区域性的经济网络成为一段时间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不同区域或区块之间相互联系和连接，助推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与过去美国主导的阶段最大区别在于极大压缩霸权国家胡乱作为的空间。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对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制度性呼应。

现在的“中国东盟+”模式，正是以中国和东盟为一个整体，拓展与其他地区或国家集团的合作，探索去中心化的“区块间互联”模式。其中包括：通过中国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东盟的“协商一致”理念共同塑造全球互动的非对抗路径，助力解决全球性问题；通过小三边框架，以“区块间互联”重塑经济全球化的动力结构，形成去中心化网络，每个节点既是资源提供者也是规则制定者，进而将传统南北对话升级为区域间多轨协商，形成“南南合作+南北对话”的混合治理框架。比如可以探索建立中国—东盟—欧盟气候对话机制，并在其中嵌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方案。同时，这种模式的非排他性、发展优先等特征，恰为全球南方突破“中心—边缘”依附体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四是以不断深化的中国和东盟协同合作奠定战略支点。二战结束以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标榜“民主、自由”，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过去欧洲殖民体系的非对称性，继承了“中心—边缘”殖民惯性，将全球治理简化为霸权国家对其他国家“施恩”。这种方式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符合国际公平正义。当前，中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达到大约19%，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覆盖全球 75%人口。当前正值世界渴望稳定性和方向感的时刻，世界各国包括周边国家普遍期待中国提供确定性，期待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东盟也有将全球交往拓展到传统合作伙伴之外的强烈需求。虽然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在焦虑心态下不断对华抹黑，渲染“中国威胁”，但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在此背景下，正在铺展开来的“中国东盟+”模式，无疑是跳出霸权逻辑的有益探索，在多极化趋势下，单一霸权模式不再适应全球治理需求，平等合作更加符合时代特征。

需兼具战略定力与制度韧性

基于“中国东盟+”的跨区域合作，是国家利益与区域组织利益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再平衡与再协调，其未来走向不是停留在经济实用主义层面，而是致力于实现区域和全球治理范式的突破，建立去中心化的多极共生合作网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有鉴于此，“中国东盟+”跨区域合作模式需要具备足够的制度弹性，以应对可能面临的一些现实挑战。比如，需要克服区域内部利益碎片化下的潜在分歧。其中一些合作主体是代表多个主权国家的区域性组织，内部可能存在较为复杂的利益协调过程。例如，东盟 10 国、海合会 6 国以及太平洋岛国论坛 18 个成员等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存在内部的梯度和差异，围绕同一议题的考量不尽相同。当个别成员的局部诉求超出区域组织的协调能力，合作进程就容易有所迟滞。为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导致的功能失灵，当合作范围不断扩展并涉及不同区域机制时，就需围绕规则兼容性加强协调，以免多边协议沦为缺乏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原则性”声明。

另外，不能忽视“美国因素”的干扰。美国推动“印太战略”落地实施，构建“四边机制（QUAD）+双边同盟”的差序架构进行选择性的拉拢分化，挥舞关税大棒的同时又对不同国家进行分化和施压。这就更要求新的跨区域合作框架既能保持战略定力，又具备应对地缘政治冲击的制度韧性。

鉴于上述复杂因素，基于“中国东盟+”的跨区域合作模式构建需要多措并举，在增进政治共识的基础上，先行推动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非敏感地带的共识积累，有效增强互信，形成新的治理伦理，以便为后续扩展至包括传统安全在内的更多领域创造条件，也为实现合作主体之间“共赢合集”的最大化提供制度转圜空间。（**本文来源：东南亚问题研究**）

深化周边区域国家研究 共筑周边命运共同体

我国幅员辽阔、边界线长，周边是实现发展繁荣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的重点、运筹外交全局的首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作为支撑这一宏大战略的基础性工程，深化周边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1. 战略维度：周边研究的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周边区域始终是中华文明秩序构建的重要场域。当前，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的历史坐标下，周边研究已超越传统学术范畴，成为关乎我国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与文明对话的战略性工程。

中国的周边地理范围涵盖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区域，并与俄罗斯、日本、印度、越南等多个邻国形成地缘交织。研究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动态、文化特征及其与中国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当前周边安全呈现复合型特征——既有领土争端、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传统威胁，又叠加大国博弈、非传统安全风险溢出等新挑战，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利益交织点，集中体现在陆地边界管控、东海权益维护及南海规则构建等议题。深化周边研究，有助于精准研判安全风险，制定差异化应对策略，维护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

有助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公共外交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周边国家国情认知的深度。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需以对象国语言互通为基础，教育合作需契合对象国的教育体制，媒体传播需把握对象国社会思潮的演变规律。只有深入了解周边国家，才能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才能更加精准地开展公共外交，把“我们想讲的”变成“受众想听的”。只有加强民心相通，塑造周边国家对华正确认知，才能讲好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故事，将“中国主张”转化为“区域共识”。例如，我国在推进“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中，结合当地对水资源和民生项目的实际需求设计传播内容；在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时，结合当地能源项目和本土化就业方案产生民生效益，等等。

有助于加强区域合作，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首先，研究周边能够为区域合作提供历史记忆与文明对话的基础。例如，通过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节点的考古研究，揭示区域内部长期存在的商品流通与族群互动网络，从而避免落入“文明冲突论”的叙事陷阱。其次，研究周边能够为政策协同构建理性认知框架。政策制定需要对各国国情有深入了解，谈判和合作需要提前预测对方的立场和反应，这些都需要周边研究提供支撑。最后，研究周边有利于推

动区域治理机制的范式创新。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多以欧洲经验为蓝本，我国的周边研究可以提炼出更具包容性的“亚洲方案”。例如，加强对中日韩合作机制的可能性、湄公河治理的多国协调、中亚国家在能源合作中扮演的角色等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互联互通、能源合作、跨境治理等议程。

2. 现实审视：周边研究的成绩与挑战

我国的周边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成果积累、政策实践与国际合作层面均取得显著进展。但也要看到，伴随国际格局演变与区域挑战复杂化，既有的研究在区域均衡、内容深度、方法论创新及现实回应能力等方面还须进一步加强。

周边研究成果积累值得肯定。从区域覆盖看，周边研究目前已形成以俄罗斯、东亚研究为“重镇”，东南亚研究为“枢纽”，南亚、中亚、蒙古国研究为“新域”的梯次布局。具体来说，俄罗斯和东亚研究相对丰富，积淀较多。东南亚研究次之，有关南亚、中亚和蒙古国的研究相对薄弱。从研究领域看，中国对周边区域国家的语言、文字和文学的研究有相对深厚的基础，各国文学作品有不少翻译为中文；对周边区域国家的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单领域研究正在开展；对周边区域国家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双边关系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

周边研究的内容还需进一步丰富。从区域均衡性看，南亚研究偏重“中印关系”；中亚研究聚焦“能源合作”领域。从内容深度看，对三边及多边机制研究相对欠缺。比如，东盟从形成至今已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火车头，但学界对其发展要素及局限性的总体分析还有待加强。

周边研究的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周边研究的方法，或仅延续古籍文献解读的传统，仍沿用“文献翻译+政策评述”的传统模式，对田野调查、大数据分析等新方法应用相对不足，难以支撑精准的政策设计；或仅聚焦于跟踪时政热点的现实问题，研究内容政策导向性还有待提高，注重经贸合作与地缘政治分析，对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的综合性分析比较薄弱，纵向的、长时段的历史考察比较少，造成分析地区局势时对对象国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机制性的解释不够充分。

3. 体系支撑：周边研究的路径创新

周边研究是对周边区域国家的整体研究，包括对其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实践、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民性的整体解释。随着全球秩序变局、周边关系变动和中国自身改革发展进程的深度联动，大力推进周边研究，既可为中国应对全球变局做好准备，也可推动各国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开展周边研究应统筹好三对关系。一是个体和整体的统一。国别研究是周边研究的基础。

我们既要对周边各国开展个体研究，也要把中国及周边各国置于全球视野下开展整体研究。既要关注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周边区域的国家，也要对距离较远但对周边区域国家的发展及其与中国关系有着重大影响的国家开展研究。二是特性和共性的统一。中国与周边国家水土不同、利益各异、文化多样，既要抓住周边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独特之处开展个性研究，也要找准与周边国家国土相接、利益相关、文化相融的内在联系，探寻彼此的共性。三是双边和多边的统一。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研究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应开展多边主义研究，以研究事实支撑中国坚持多边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开展周边研究应着力于“共同性”。一是梳理共同历史。中国与周边国家千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不绝，书写了无数共同的历史记忆。例如，深化对古代丝绸之路等共同历史记忆的研究，有助于周边国家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逻辑，增强参与共建的认同感，推动倡议行稳致远。二是凝聚共同意识。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中国梦与周边国家发展愿景对接，探索符合共同利益的现代化路径，构建求同存异、互信互利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三是寻求共同利益。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需超越单一国家研究，开展超国家、跨学科的综合分析，聚焦战略互信、地区安全、人文交流、经济合作等领域，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维护区域稳定繁荣提供智力支撑。

开展周边研究应加强自身建设。我国的周边研究亟须站在自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高度，从学科体系、资源保障、评价机制三方面提升研究水平。一是创新研究范式，构建“基础—应用”贯通的研究体系。对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基础性议题，在开展长时段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加强研究的时事导向；对“一带一路”建设、区域合作机制等应用性议题，在强化政策模拟、风险评估等工具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大程度结合国情进行综合性分析。二是优化研究保障，夯实“田野—智库”联动的研究基础。在田野调查层面，重点支持长期追踪研究项目，并配套小语种人才驻外研究制度；在智库建设层面，推动高校区域研究机构与外交部、发改委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平台。三是改革评价机制，塑造“包容—自主”的研究生态。建立周边研究专项评估体系，构建均衡的区域研究图谱。同时，鼓励学者用“原创概念”开展知识生产，构建周边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本文来源：中国周边安全研究中心**）